

近郊空心村的空间现状与环境微更新策略

——以常州马鞍桥村为例

杨天琦 石运达

常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 江苏 常州 213159

【摘要】：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近郊空心村处于城市要素外溢与乡村人口外流的交汇地带，是城乡矛盾最集中、人居环境亟待改善的村庄类型。本文以常州市新北区原马鞍桥村（2024年12月并入新龙村）为调研对象，通过实地踏勘与留守老人访谈，梳理其空间现状并识别核心问题。调研发现，该村呈现人口空心化、聚落被交通设施切割、环境与公共服务失管、历史遗存（修善寺、普福桥等）闲置破败等复合困境，其根源在于村民与土地、村庄日常联系的断裂以及公共服务供给的失衡。据此，本文提出空间缝合、风貌与文化记忆微修复、轻量业态活化、多元主体机制活化四类环境微更新策略，以期长三角同类近郊空心村的人居环境改善提供参考。

【关键词】：城乡融合；近郊空心村；空间现状；问题识别；环境微更新

DOI:10.12417/2811-0528.26.20.072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城乡关系进入融合发展阶段。《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将村庄划分为集聚提升、城郊融合、特色保护、搬迁撤并四种类型^[1]，其中城郊融合类村庄地处城市近郊，既承接城市功能外溢，又保留乡村空间特征，是城乡要素流动最频繁、空间冲突最集中的区域。苏南地区是这一矛盾的集中显现区域，作为改革开放后国内率先实现全域工业化、城镇化的区域之一，苏南乡村在享受城市发展红利的同时也被城市扩张深刻改写，部分近郊村落并未如人们想象的那样融入城市，反而在人口外流与设施过境的双重作用下走向空心化^{[2][3][4]}。

面对这类村庄，设计学科应当做什么、能做什么，是一个值得认真回答的问题。地理学界对空心村的演变规律与整治模式已有系统研究^[5]，规划学界亦积累了村庄分类与空间治理的丰富成果^[6]，刘守英、王一鸽以“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概括了乡村人口与土地关系的结构性转型^[6]。然而，站在环境艺术设计立场、以空间现状调查为起点、面向后续设计介入的个案研究仍显不足^[7]。消极的桥下空间、失管的河道驳岸、闲置的老宅厂房、无处安放的村史记忆，恰恰是环境艺术设计最熟悉、最擅长的议题，需要的不是宏大的拆建，而是对日常生活空间的细致修补，这正是“微更新”的价值所在^[7]。

本文以常州市新北区原马鞍桥村为例。马鞍桥村是苏南地区典型的近郊空心化水乡村落，本研究结合实地踏勘，沿村内街巷与河塘记录空间要素，并对留守老人进行访谈，希望借这次调研，为马鞍桥村乃至同类近郊空心村的活化提供一份问题清单与策略思路。

1 马鞍桥村的基本境况

常州地处长三角腹地，自古为江南水乡重镇，地方文化积淀深厚^[11]。马鞍桥村（原马鞍桥行政村片区）位于常州市新北区新桥街道，北侧毗邻城北森林公园，村域北侧设有轨道交通站点，属城市近郊，长江路、龙江路等城市快速路与高架自村域穿过，将聚落分割为若干组团。片区是典型的江南水网圩田聚落，河塘密布，周围的村落沿河塘零散分布，呈“小微组团、依水而居”的形态^[11]，延续了苏南水乡“聚村而居”的聚落传统^[10]。部分自然村仍存“前街后河”的格局，河埠、晒场等节点大多已消失或衰败。

建制上，1958年成立新桥人民公社，研究片区设立为马鞍桥大队，1983年江苏省全面实施政社分设，大队改制为独立马鞍桥行政村，2024年12月撤销并入新龙村，原村委会驻地作为新龙村全域公共服务核心^[20]。目前村内户籍人口大量在城区购房定居，人户分离严重，常住居民以高龄留守老人为主，青壮年与学龄人口几乎不在村内生活，耕地已整体流转给种粮大户，实行稻麦轮作，间有大棚蔬菜，流转租金约千元一亩，村民不再自行耕种。历史上村办集体企业改制后，集体经济仅靠土地租金与厂房租赁维持，造血能力减弱，支撑环境更新力不从心。从类型上看，马鞍桥村并非远郊村，而是兼具近郊区、半空心、交通切割、文化遗存待活化、基层治理亟待重构多重特征的复合型典型样本，其问题很难用单一手段解决^{[3][5]}。

2 空间现状与问题识别

通过对现场踏勘记录的梳理，马鞍桥村的空间现状可以从五个相互交织的方面来认识。

2.1 交通切割与村落可识别性丧失

村口虽设有轨道交通站点,但沿途没有任何路牌或标识提示村落的存在。对于一座拥有千年古寺、古桥的水乡村落而言,这种“看不见的入口”本身就意味着可识别性的丧失。长江路、龙江路等快速路与高架从村域穿过,把原本连续的聚落拆分为多个相对孤立的组团,桥下形成大片消极空间。切割改变了村落的生长逻辑,原本沿河展开的村庄,如今被迫在高架与快速路之间见缝插针,空间秩序进一步瓦解。交通设施在提升区域通达性的同时,切断了村庄内部的步行与视线联系,村口缺乏“村门”意象,村落整体性与可识别性被严重削弱。

2.2 环境与设施失管

进村路口即可闻到明显的垃圾异味,村内垃圾清运与保洁覆盖不足,垃圾堆放点缺乏管理。普福桥下河道水体发绿、藻类丛生,水位偏低近干涸,驳岸破损,水乡“活水”的意象荡然无存。村内路灯很少,夜间照明不足,缺乏统一的导视系统。村内小型广场杳无人迹,数套久经日晒、漆面斑驳发白的健身器械零散摆放,是乡村公共空间活力流失的具象表征。党群服务中心是片区公共服务的核心,但周边仅配置了较为陈旧、简陋的设施,外围自然村几乎没有任何村口标识或小型游园。

2.3 建筑闲置与风貌混杂

村内传统民居与新建砖混楼房混杂,传统民居多为砖木结构、坡屋顶,新建房屋则常见瓷砖贴面与彩钢瓦顶,新旧之间缺乏过渡,风貌趋于混杂。部分老宅闲置甚至坍塌,甚至挂有“百年老宅”标牌的建筑仅以钢丝网围合,处于既未保护也未利用的状态。村办老厂房旧址亦多处闲置。建筑闲置与衰败使风貌整体失序,“有历史、无修缮”的状况持续削弱村落的场所感与视觉形象。值得注意的是,村民自发的翻建并非缺乏审美,而是在缺乏专业引导的情况下,只能借用城市常见的新材料表达“现代化”的愿望,风貌引导不能止于禁止,更要提供可替代的样板与低成本的乡土建造方案。

2.4 生活业态消亡与日常疏离

村内无基础零售商业配套,村民采购生活日用品需往返8公里,公共服务可达性较差。对腿脚不便的高龄老人而言,这一距离几乎意味着日常生活被“外部化”,买一袋米、看一次病都要依赖子女或公共交通。村民普遍不再耕种,耕地整体流转后,农业只作为土地租金的被动收益,业态消亡迫使村民的日常生活全面依赖城市。村落内部缺乏面向老人的服务设施,日间照料、理发、代购等基本需求均需外求。访谈中老人对村庄的记忆依然清晰,谈起过去繁荣的老街满是留恋,却很少相信村庄还能恢复活力——这种“有记忆、无期待”的心态,比空间的破败更值得警惕^[13]。

2.5 文化遗存闲置与文脉断裂

马鞍桥村的文化遗存并不匮乏,修善寺相传始建于隋代,距今约1500年,是村内最显著的建筑,现存建筑为2011年以来复建,墙面通体采用白色普通涂料饰面,传统营造特征缺失,历史场所韵味不足,普福桥(当地亦称马鞍桥)为民国十八年重建的单孔石拱桥,但桥面杂草丛生、石阶上布满青苔,桥下绿藻近干涸。这些遗存普遍处于“有资源、无场所、无叙事”的状态,寺庙失韵,古桥破败,村史与记忆缺乏承载空间,场所衰败使村民的地方感与记忆难以延续^[12]。

2.6 问题小结与成因简析

综上,马鞍桥村的问题可归纳为五类:空间被基础设施割裂,空心化导致建筑闲置与风貌衰败,公共服务与环境供给失衡,生活业态消亡,文化遗存闲置与记忆断层。这五类问题构成“人口外流—空间闲置—治理弱化—衰败加剧”的循环,近郊区位与城镇化吸纳引发人口外流,外流导致空心化与闲置,闲置衰败使公共空间萎缩、治理成本上升,治理缺位又加速衰败^{[14][15]}。从成因看,苏南模式遗留的集体造血能力薄弱,并村后资源向中心集聚导致外围失管,规划编制期的留白使设施维修缺乏主体,加之历次更新重建轻文化活化^[7],多重因素共同造成了今天的局面。

3 环境微更新策略

“活化更新”不是推倒重建,而是在尊重乡村风貌与历史文脉的前提下,对空间、文化与生活进行渐进式的除旧布新^[7]。本文遵循“轻介入、低成本、渐进式”的原则,针对五类问题提出四类相互支撑的环境微更新策略,统摄于“活空间—活服务—活记忆—活产业、活人气、活村庄”的主线。

3.1 缝合破碎空间,激活消极地带

针对交通切割问题,首要任务是把被道路和高架拆散的空间重新“缝”起来。高架桥下的大片消极空间可以改造为口袋公园与慢行休憩节点,布置座椅、健身设施与遮阴绿化,让原本无人问津的“桥下”成为村民纳凉、聊天的日常场所,增设跨道路的景观人行通道与滨水连续绿道,串联分散的自然村组团,在村口与轨道交通站点之间建立完整的标识导视系统,让“看不见的入口”重新被看见,使“地铁站—村口—古桥—修善寺”成为一条可感知、可步行、可停留的连续路径^{[16][17]}。空间缝合以恢复日常可达性为先

3.2 修复水乡风貌,延续文化记忆

针对环境失管与文化衰败问题,环境整治与文化修复应当同步推进。实施河道清淤与生态护坡改造,对原生土质岸坡采用乡土植被、自然块石与水生植物进行固坡造景,恢复水乡“活

水”景观,同时整治垃圾堆放点,建立保洁的长效安排,以乡土材料开展宅前屋后小微游园与绿化,避免大拆大建^[16]。对普福桥、修善寺等历史节点进行环境整理与标识解说,对“百年老宅”等坍塌建筑采取“抢救性保护+功能再利用”的引导,保留其历史信息而非简单拆除。文化记忆的修复尤其需要为村史提供承载空间,可在党群服务中心或古桥节点设置小型村史角,把宗族聚居、建村传说与农耕记忆整理上墙,让记忆在代际之间传递^[18]。

3.3 引入轻量业态,恢复日常活力

针对业态消亡问题,空间的活化最终要靠人的使用来支撑。可依托闲置民居与老厂房发展低冲击的乡村文创、农事研学与近郊短途休闲,为空间注入人气,同时兼顾留守老人日常需求与村域经济活化,依托邻近城北森林公园的客流优势,在村口打造特色农产品便民商超,承接近郊休闲人流,顺势引导村民自主发展农家乐等乡村休闲业态,联动轨道交通站点构建“轨道交通—森林公园—水乡村落”的近郊休闲路径,形成客

流导入与村域增收的正向循环。

3.4 多元主体参与,形成长效机制

针对治理缺位问题,环境微更新的成果能否长期保持,取决于有没有人持续管护。应当构建“政府引导—村民参与—设计赋能”的协同机制,相关部门放权赋能,把公共空间维护、绿化养护等事务交给村民自治组织,引导村民参与人居环境治理,形成多主体长效共治^[19],设计师作为场地、人、资源之间的枢纽,不仅要完成空间设计,更要帮助村庄建立自我更新能力^[7]。运营前置是机制活化重要原则,方案阶段就应明确“谁来用、谁来管”,避免“建成即闲置”。

4 结语

本文以常州马鞍桥村为例,通过实地调研识别了近郊空心村的五类核心空间问题——交通切割、环境失管、建筑闲置、业态消亡与文化断层,并据此提出空间缝合、风貌与文化记忆微修复、轻量业态活化与多元主体机制活化四类环境微更新策略。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Z].2018.
- [2] 刘彦随,刘玉,翟荣新.中国农村空心化的地理学研究及整治实践[J].地理学报,2009,64(10):1193-1202.
- [3] 龙花楼,李裕瑞,刘彦随.中国空心化村庄演化特征及其动力机制[J].地理学报,2009,64(10):1203-1213.
- [4] 龙花楼,陈坤秋.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中国乡村居住形态变迁与空间治理转型[J].经济地理,2024,44(9).
- [5] 谭林,龙花楼.中国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现代化转型[J].地理学报,2026,81(2).
- [6] 刘守英,王一鸽.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中国转型的乡村变迁视角[J].管理世界,2018(10):128-146,232.
- [7] 蒋志英,贺丹.艺术设计介入乡村环境活化更新模式研究[J].美与时代(城市版),2023(10):98-100.
- [8] 戈大专.面向城乡融合发展的中国乡村空间治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24.
- [9] 龙花楼.论土地整治与乡村空间重构[J].地理学报,2013,68(8):1019-1028.
- [10] 费孝通.乡土中国(修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 [11] 葛金华.江苏地方文化史·常州卷[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
- [12] 段义孚.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M].王志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 [13] 廖军华,王丽莎,吕培亮.城乡融合进程中村落共同体秩序变迁及重建的实践逻辑[J].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24(5).
- [14]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助力乡村空心化治理的作用机制探析:基于乡村功能演化视角[J].中国土地科学,2023(11):84-94.
- [15] 石亚灵,张悦,周政旭.乡村空心化的社会网络演变特征及规划响应——以四川省A村为例[J].城市规划,2024(1).
- [16] 宋正正.设计轻介入——崔愷乡建设计中的本土意识[J].时代建筑,2017(1).
- [17] 徐甜甜.松阳故事:建筑针灸[J].建筑学报,2021(1).
- [18] 地方感视域下村史馆的建设路径和启示——以常熟市蒋巷村村史馆为例[J].山西档案,2023(5).
- [19] “共同缔造”理念下乡村公共空间更新治理研究[J].襄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4(5).
- [20] 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新桥街道部分村民委员会(股份经济合作社)调整的批复[EB/OL].(2024-12-24)[2026-08-17].
http://www.cznd.gov.cn/html/cznd/2024/HIBPKAMM_1225/21959.html.